

建安七子集校註

吳云 主編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達安七子集校註

吳云 主編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**(津)新登字007号**

责任编辑：王沛霖

封面设计：马 强

**建安七子集校注**

吴 云 主编

\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湖北路27号)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 15.5印张 5 插页 387千字

1991年11月第1版

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

**ISBN 7-80504-168-7**

**I·31 定价：8.20元(精)**

**6.20元(平)**

## 前 言

“建安七子”的名称最早见于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。他说：“今之文人，鲁国孔融文举、广陵陈琳孔璋、山阳王粲仲宣、北海徐干伟长、陈留阮瑀元瑜、汝南应场德璉、东平刘楨公干，斯七子者，于学无所遗，于辞无所假，咸以自骋骥驎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驰。”曹丕称赞“七子”学识广博，文章也写得好，各以其学说、文辞驰骋于文坛，并驾齐驱。下面我们谨根据曹丕所排列的顺序，对“七子”的生平创作试加评述。

### 一

孔融(153—208)，字文举，鲁国(今山东曲阜)人。他是孔子二十世孙。他的七世祖孔霸做过汉元帝的老师，官至侍中。父亲孔伉曾任太山都尉。孔融年幼便表现出才华过人。年十岁，随父亲到京城洛阳定居，不久父亲死了。尽管孔融幼年丧父，但他童年时所受的家庭教育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好学，对他后来的成长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孔融二十八岁入仕。他刚刚走进官场，就表现出正直、不畏豪强的可贵品质。当孔融被司徒杨赐辟为属吏时，汉王朝正在发动检举贪官污吏。孔融积极执行，专门揭发大官吏亲友中的贪官。此事使上层官吏颇为恼火，并派人质问孔融，而融则“陈对罪恶，言无阿挠”（《后汉书孔融传》有关孔融事迹的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出本传）使被责问者在事实面前只好认输。此后孔融又被征辟为

司空掾，在职三天便升任虎贲中郎将。恰逢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，立献帝，杀何太后，自任国相。孔融对此事颇气愤，每次议论废立事，“辄有匡正之言，以忤卓旨。”董卓见孔融反对自己，将融转为议郎。当时农民起义军占据各州郡，尤其是在北海郡（今山东潍坊）一带的势力最雄厚。董卓不敢亲手杀掉大名士孔融，于是在朝廷上提出建议：让孔融任北海相，想借农民起义军之手收拾孔融。孔融毕竟是个文人，他既无军事才能，又无战争经验，与农民军两次交锋皆败北。建安元年（196）曹操迎献帝都许昌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，不久又升任少府（九卿之一）。孔融认为“兼善天下”，为国尽力的时机到了，在朝廷上议论国家大事，引经据典，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。孔融在任少府期间除给献帝上书提建议外，还推荐了一些有才华的人。前者如《崇国防疏》、《上汉帝书》等。后者如《荐祢衡疏》、《上书荐谢该》等。总之，从建安元年到被杀，孔融在献帝周围任职的十二年间，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。

论述孔融，应重视他与曹操的关系。这不仅由于孔融被曹操所杀害，而且从二人关系的始末，还可窥见他们的为人。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为灵帝末年，孔融任北海相的六年时间。在此阶段内，孔融对曹操持怀疑态度，并存有戒心。当时袁绍和曹操在北方形成两股巨大势力，而孔融被黄巾军所包围时，孔融宁肯派人向刘备求援，也不向曹操呼救，原因是“融知绍、操终图汉室，不欲与同”。证明孔融对曹操的怀疑是有先见之明的。后来曹操确实掌握了东汉政权。

第二阶段，从建安元年（196）到建安九年（203），此乃孔融对曹操寄希望时期。曹操拥戴献帝，并把他从残破的洛阳接到许昌，还能把孔融等社会名流委以重任，加上在战场上屡打胜仗等事实，孔融此时认为曹操有可能，也有能力辅佐献帝“匡复汉室”。因此在建安初的一段时间内，孔融多次推荐人才，还在《六言诗》

三首和《与王朗书》等作品中歌颂“曹公忧国无私”。然而事与愿违，随着曹操在北方军事上的胜利，在政治上不仅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而且把献帝当傀儡的迹象日趋明显。

第三阶段，从建安九年(204)到建安十三年(208)，此乃孔融公开反对曹操时期。建安九年，曹操攻下邳城，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。孔融写信给曹操嘲讽说：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”。于本年孔融还写了《上书请准古王畿制》的奏疏给献帝。孔融拟用《周礼》的规定来限制曹操的野心，这就使“操疑其所论建渐广，益惮之。”建安十二年(207)，曹操北征乌桓，孔融写了《与曹公书矚征乌桓》，反对操征乌桓，认为这是小题大作。由于战争粮食缺乏，曹操提出禁酒，孔融接连写了两篇《难曹公表制酒禁书》，提出酒对治国安邦，大有益处，公开同曹操唱对台戏。

建安十三年(208)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。本年六月，自为丞相。此时杀孔融条件已成熟，于是操授意军谋祭酒路粹，诬告孔融“欲规不轨”并与“祢衡跌荡放言”，以“不孝”为名，“书奏，下狱弃市。”妻子儿女同时被杀。

孔融晚年为什么要坚决反对曹操呢？我们认为孔融头脑中的传统观念，特别是“忠”的观念，乃是他屡次反对曹操的最主要原因。中国封建社会中“忠”的观念与尊重正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孔融从正统观念出发，认为曹操应真诚地辅佐献帝，而不应把他当傀儡，自己掌握国君之权。此种“忠”的观念，早在他任北海相之前就有所表露。例对董卓为夺权而搞废立时，“融每因对答，辄有匡正之言”，即反对废少帝立献帝之事。当然我们都了解董卓搞废立和曹操的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同，董、曹也不宜同日而语，但在正统“忠”的观念极深的孔融看来，他们二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均应在反对之列。

孔融反对曹操的另一原因，是受东汉清议风气的影响。汉末政治黑暗，致使一些鲠直的知识分子，由看不惯当权者，进而评

论时政和指责当权者，为此清议之风兴起，党锢之祸酿成。汉末当权者，对党人和清议之士曾进行残酷地镇压，其后果是党人之祸愈酷，而名愈高，天下皆以党人为荣。此种风气也影响了孔融、祢衡等人。孔融少年时就敬慕党人领袖李膺，并设法与之相见，后又掩护“党人”张俭。孔融入仕后，始则批评董卓，继而反对曹操专权，这些均与汉末清议风气有直接关系。

孔融反对曹操，还在于他自以为出身名门，才学出众，在当时有大名，曹操不敢杀他。其实孔融是错估了形势和看错了对手。孔融不了解曹操不仅有治国安邦的才能，还会耍政治手腕特别是杀害“异己”，绝不手软。过去未杀孔融，仅是条件尚未具备，一旦条件成熟了，即便是他的好友也是要杀的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崔琰传》载：“太祖（曹操）性忌，有所不堪者，鲁国孔融、南阳许攸、娄圭，皆以恃旧不虔见诛。而琰最为世所痛惜，至今冤之。”

孔融一生的政绩谈不上卓著，然而他的创作，特别是他的文章在当时是名震天下的。融被杀后，曹丕征集其遗文二十五篇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孔融的作品为九卷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均为十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无记载，而《明史·艺文志》亦为十卷。明代张溥所辑的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中的《孔少府集》仅一卷，而其文章又多为残缺不全。为此我们认为孔融的著作，在隋、唐时还存留于世的九卷或十卷，大约在宋时亡佚。清末丁福保所辑《汉魏六朝名家集》初刻中的《孔少府集》，看到孔融的文（包括书、疏、议、对、令、论、铭）三十八篇，诗八首。

孔融文章最突出的特点是气盛。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指出“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”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才略篇》也说：“孔融气盛于为笔，祢衡思锐于为文”。后代许多学者也都指出孔融文章气盛的特点。然而历代对“气”的解释却差异较

大。解放后出版的几种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，多数认为“气”是指“才气”或“气质才性”。这样释“气”有一定道理，但放到具体作家作品中去运用，却往往对不上号。例如刘勰在论述嵇康、阮籍诗文特点时指出：“嵇康师心以遣论，阮籍使气以命诗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）此处所说的“使气”显然就不是仅用“才气”能概括得了的。我们认为倘若把“气”释为创作的激情，似较为贴切。综观孔融反对曹操等的文章，均在胸中有强烈创作激情下写出来的。由此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“气盛”与作者性格有密切关系。孔融性格特点是认真；而认真便趋于激烈，反映到写文章上来就形成强烈的创作激情，从而形成“气盛”的特色。

孔融写作时不仅使气以命文，还进而“使气以命诗”。他临刑前写的《临终诗》便是极好的例证。全诗仅十六句，饱含着作者的无限激情！“言多令事败”，他意识到将被杀害，是由于好发议论。为此他感到当时政治太黑暗了：“谗邪害公正，浮云翳白日”，正直的人倒霉，阿谀奉承的人反而吃得开。尽管人言可畏、正直被杀，但他宁肯站着死，也不跪着生。诗的结尾二句“生存多所虑，长寝万事毕”，表面上似说一死了事；然而从全诗中可看出此二句只有激愤而无悔恨。孔融对当时社会昏暗的深刻认识，形成了临刑前的创作激情；而此种激情促使他写出了“气盛”的诗篇。

孔融文章的另一特色是辞藻华丽，对偶句增多，大量用典，使其部分文章呈现出骈体化的特色。例如《荐祢衡疏》，此文多为四字句，重对偶，善用典，其文采尤为可观。故刘勰说“至于文举之《荐祢衡》，气扬采飞”（《文心雕龙·章表》），即文气昂扬，文采飞动。

孔融的文章的又一特点是善嘲讽，而其讽刺对象仅仅针对曹操。除前面我们已举过的不私纳甄氏、操征乌桓，孔融加以嘲讽外，关于操倡导禁酒，孔融却道：“昨承训答，陈二代之祸，及



众人之败，以酒亡者，实如来海。虽然，徐偃王行仁义而亡，今令不绝仁义；燕唵以让失社稷，今令不禁谦退；鲁因儒而损，今令不禁文学；夏商以妇人亡天下，今令不断婚姻，而将酒独急者，但惜谷耳，非以亡王为戒也。”与曹操禁酒的主张针锋相对，步步紧逼，你曹操这样讲，我孔融偏那样说。行文酣快淋漓，嘲讽有力，真是喜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曹丕说孔融的文章“不能持论，理不胜辞”（《典论·论文》），即不善于说理。我们认为这是曹丕的偏见。可能由于孔融曾在文中批评他私纳甄氏，他才对融文有如上之评语，其实孔融的文章均言之成理的。

孔融的诗除上面我们已论述过的《临终诗》外，还有《六言诗》三首。内容写汉末董卓及其部下郭汜、李傕作乱，把献帝挟持到长安，后献帝回到洛阳，又被曹操接到许昌，主旨是歌颂曹操的，此诗可按历史来读，其艺术性实为一般。此外还有一首《离合合作郡姓名诗》，用二十二句诗合成“鲁国孔融文举”六个字，实乃文字游戏，内容和艺术性均无可称道。至于收进《孔少府集》内的《杂诗》二首，逯钦立先生在其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一书中指出：“经证知出《李陵集》”。从内容考察此二诗确与孔融的经历、思想不相吻合，故于此不再论述。

综观孔融的一生的为人和著文均值得称颂。他不仅是汉末大名士，而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，“曾以孔融的态度自比”（冯雪峰《过去的时代·鲁迅论》）。在风雨如磐、白色恐怖的旧中国，鲁迅前期的政治态度和写的杂文，确实与孔融有某些相似处。上述事实启示我们：对古代作家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，对孔融这位建安时代著名的作家，应给予足够的重视，并恢复他在文学史上应享有的地位。

## 二

陈琳（约160—217），字孔璋，广陵射阳（今江苏省淮安县

东南)人。早年以善属文章，才华出众而著名州郡，他与孔融均为汉末大名士。陈琳的第一任官职是担任何进的主簿。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，太后不同意。于是何进拟用召四方猛将引兵向京城，以威吓太后。陈琳建议何进依靠自己兵力速决此事，何进不采纳陈琳的建议终于失败而被杀。何进死后，其部下群龙无首，纷纷归属董卓；陈琳也于此时投奔董卓。然而董卓进入京城之后，废帝弑后，滥杀无辜，山东群雄蜂起而讨之。陈琳看到这种情况，就前往冀州投奔袁绍。陈琳在后来写的《应讥》一文中说：“既乃卓为封蛇，幽鸩帝后，强以暴国，非力所讨，违而去之宜也。”袁绍被曹操击败，琳又投归曹操。操任命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，掌管记室。当时曹魏的军国书檄，多出自陈琳、阮瑀之手。陈琳的最后一任官职是门下督(大将军的属官)。建安二十一年(217)，一次大的瘟疫夺去了陈琳的生命，终年约五十七岁。

陈琳的作品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三卷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均著录十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仍著录十卷。但明代张溥所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中的《陈记室集》仅为一卷，而又多为残缺不全。我们认为陈琳大部分作品亡佚也在宋代。宋之后各史《艺文志》虽著录为十卷，仅存目而已，实则无书。今据张溥、丁福保辑本和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整理出赋十篇，文九篇，诗五首。严可均删去三篇可疑之文(《为袁绍上汉帝书》、《为袁绍与公孙瓒书》、《为袁绍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版文》)附录于后，以备参考。

陈琳的著作，当首推其文，尤其是《为袁绍檄豫州》一文最为出色。文中对曹操及其父祖罪行的揭露与批判，一针见血，痛快淋漓，深刻表达了汉末人们对宦官这股恶势力的憎恶之情，为此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赞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檄移篇》中云：“陈琳之《檄豫州》，壮有骨鲠，虽奸阉携养，章密太甚，发邱摸金，诬过其虐，然抗辞书衅，噉然露骨矣。”刘勰认为陈琳的

《为袁绍檄豫州》一文雄壮有力，有一种刚正之气，所以尽管“章密太甚”而又“诬过其虐”，但它用正义之辞揭露了曹操及其父祖的罪状，使其暴显于光天化日之下，这点是值得肯定的。正如张溥所说，陈琳“栖身冀州，为袁本初草檄操，诋操，心诚轻之，奋其怒气，词若江河”（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》）。

“心诚轻之”，言之最切。只有在这时，陈琳才是一个以真实面目出现的汉末名士，故能“奋其怒气，词若江河”，写出了这千古奇文，才有这“壮有骨鲠”的艺术风格。

“壮有骨鲠”，特点是感情强烈，和文辞端正刚直，只有强烈的正义之情才能打动人心；只有文辞端正刚直，才能最完美地把正义之情表现出来。所以《文心雕龙·风骨赞》曰：“蔚彼风力，严此骨鲠”。此处“风力”与“骨鲠”是互文见义。风力，实际上讲的就是“风骨”，如钟嵘提倡“建安风力”，也就是在讲“建安风骨”。“骨鲠”，亦是言“风骨”。《文心雕龙·风骨篇》云：“是以悵悵述情，必始乎风，沉吟铺辞，莫先于骨。故辞之待骨，如体之树骸，情之含风，犹形之包气。结言端直，则文骨成焉；意气骏爽，则文风清矣。”这段话也正说明了陈琳“壮有骨鲠”的特色。

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一文中说过：“归纳起来，汉末魏初的文章，可说是‘清峻、通脱、华丽、壮大’。”“七人（指“建安七子”）的文章很少流传，……大概都不外是‘慷慨、华丽’罢。”“清峻，通脱”，鲁迅主要指曹操的文章，而对“建安七子”的文章，鲁迅以“华丽、壮大”和“慷慨、华丽”评之。其实“华丽”正是我们下面要说的陈琳“词彩飞扬”的特色，而“壮大、慷慨”也就是陈琳“壮有骨鲠”的特点。

“壮大”指文章写得气势奔放、宏壮，陈琳文章，确实如此。《为袁绍檄豫州》一文，骂曹操的祖父父亲，一直到曹操本

人，丑恶阴私之事，一桩桩、一件件揭露无遗，其文章气势如悬河之水，奔腾澎湃，势不可遏，所以连曹丕也不得不承认“孔璋章表殊健”（《与吴质书》）。“殊健”，即是指文章气势之“壮大”，曹丕以“气”论文，即推崇的是此类文章。而“殊健”、“壮大”，都离不开“慷慨”。

慷慨，《说文解字》释曰：“慷慨，壮士不得志也”，这说明慷慨乃是刚正壮烈之士所发出的不平之情。不平的原因很多，主要是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紧密相联的。《汉书·叙传》云：“家本北边，志节慷慨，数求出使匈奴。”班固这里谈的是汉代，在建安年间更是如此，当时国家动乱，人民受难，象陈琳、孔融一类名士，他们认为祸乱的根源是宦官的胡作非为，而曹操作为宦官的后代，他身上又确实有宦官贪暴、残酷的特点，这样陈琳批判起曹操来就认为自己是正义在手，故义正辞严，激昂慷慨，从而形成了陈琳文章的又一个特色。而刘勰用“慷慨正气”、“梗概多气”来概括“建安风骨”的特征，也是非常恰当的。

在建安时代，曹丕对陈琳文章是颇为赞许的，他在《与吴质书》中这样说：“孔璋章表殊健，微为繁富。”曹丕的艺术目光是非常敏锐的，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陈琳作品的两大特点：殊健、繁富。当然，曹丕所说的“微为繁富”并非褒语，他的意思是说陈琳之作有点过于“词彩飞扬”了。尽管如此，它却有利于我们对陈琳的艺术风格进行更深的探索。

从总体上说，“词彩飞扬”确实不失为陈琳作品的一大特点，不仅他的代表作《为袁绍檄豫州》、《武军赋》是这样，就连他写的书信也是这样，如《为曹洪与魏太子书》中有云：

盖闻过高唐者，效王豹之讴；游睢涣者，学藻绘之彩。闲自入益部，仰司马、杨、王遗风，有子胜斐然之志。故颇奋文辞，异于他日，怪乃轻其家丘，谓为倩人，是何言欤！夫绿骥垂耳于林垆，鸿雀戢翼于汙池，衰之者固以为园囿之

凡鸟，外厖之下乘也，及整兰筋，挥劲翻，陵厉清浮，顾盼千里，岂可谓其借翰于晨风，假足于六驳哉？

由上文可见，陈琳的“词彩飞扬”并不是过分地用华丽词藻，为形式而形式。他多用典，但使人觉得并不晦涩；多俳偶，但使人觉得并不造作；音节铿锵，抑扬顿挫，但使人觉得并非有意为之。这一切表现在作品里，就如同江河大海的波涛一般，汪洋恣肆，自然涌起。

对于陈琳的辞赋，当时人评价不高。曹植在《与杨德祖书》中说：“以孔璋之才，不闲于辞赋，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，譬画虎不成，反为狗也。”我们从陈琳作品中可以看出，作者对司马相如是相当崇拜的，他曾多次引用司马相如的原文，并极力仿效司马相如的风格，但并不太成功。只有《武军赋》一篇，还略得后人赞赏。葛洪在《抱朴子·钧世》中云：“等称征伐，而《出车》、《六月》之作，何如陈琳《武军》之壮乎？”

《武军赋》是陈琳辞赋的代表作，在谈到其风格时，葛洪亦以“壮”称之。今观其文，实不为虚，开头第一句：“赫赫矣，烈烈哉！”先声夺人，表示强烈的感叹，李白的《蜀道难》的开头似由此得到启发。而下面的“当天符之佐运，承斗刚而曜震”，俨然以宇宙的主宰自居，这是多么大的气势！

陈琳的诗作不多，现存（包括残缺的佚句）一共九首，较为著名的是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它感情真挚，通俗平易，尤其是用对话来展开故事情节，对后世影响较大。仇兆鳌评杜甫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云：“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设为问答，此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诸篇所自来也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卷七）

综观陈琳的为人和为文，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是“四易其主”，一是“壮有骨鲠”。二者似乎是矛盾的，但在陈琳身上又却是统一的，它反映了汉末名士在性格上的扭曲状态。社会动乱，军阀混战，当时人们是难以预见究竟谁是胜利者的。而当时

名士们的“投主”又并非是盲从，他们的“投主”实际上是一种手段，企图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如陈琳诗云：“庶儿及君在，立德垂功名。”若此种理想能够实现，即使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出发，“四易其主”也是无可厚非的。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形成了陈琳文章“壮有骨鲠”特色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使陈琳不得不“四易其主”。“壮有骨鲠”与“四易其主”这一矛盾的现象，由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统一起来了。

### 三

王粲（177—217），字仲宣，山阳高平（今山东邹县）人。粲出身名门。曾祖父王龚有高名于天下，顺帝时任太尉。祖父王畅，灵帝时任司空。畅又与汉末党人领袖李膺为好友。当李膺因党锢之祸被杀，王畅也弃官家居。粲父王谦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，后病歿于家。

王粲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渡过的。献帝初平元年（190）董卓之乱，献帝西迁，王粲流浪到长安，时年仅十四岁。当时闻名的大学者蔡邕也在长安。王粲前往拜访蔡邕，邕因为高兴和急于出来迎粲，连鞋子都穿倒了。由于王粲年幼，身材短小，在蔡邕家做客的人都为之惊愕。然而蔡邕认为王粲是个出众的人才，对在座的宾客说：“此王公（指粲曾祖龚曾任太尉，祖父畅任司空，均属三公的官职）孙也。有异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。”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粲传》）王粲十六岁（192），王允、士孙端等杀董卓，司徒王允建议王粲任黄门侍郎，因时局混乱，粲未到任。同年粲与族兄王凯、友人士孙文始前往荆州刺史刘表处避难。刘表曾就学于粲祖父王畅，两家有世交。刘表见王粲容貌丑陋和放达不拘小节，未能委以重任。王粲在荆州过了十六年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。有时为刘表起草书信，如《为刘荆州谏袁谭书》、《为刘荆州与袁尚书》；有时为刘表撰文，倡

导儒术，如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，阐明在荆州设文学官的重要性。总之此时祭之地位不高，更无实权。

建安十三年（208），曹操南征刘表，表病死。王祭规劝刘表子刘琮顾全大局，审形势，及早投归人心所向的曹操。刘琮听了王祭的规劝，降曹。曹操以王祭劝刘琮归降有功，任命祭为丞相掾（曹操的亲随吏员），赐爵关内侯。此后王祭又任军谋祭酒。建安十八年（213）曹操自为魏公，晋升王祭为侍中（比二千石），职位在七子中算是较高的了。王祭知识渊博，曹操每有发问，祭均给予圆满回答。由于魏国刚刚建立，旧的许多制度都废弛了，新的制度急待建立，这项重任就由王祭负责。建安二十一年（216）王祭跟从曹操东征孙吴，次年因瘟疫死于征途中，年仅四十一岁。王祭生前与曹丕、曹植在邺下来往密切，共同赋诗作文。

王祭的诗文集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十一卷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均为十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为八卷，《明史·艺文志》亦为十一卷。然而明代张溥之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中的《王侍中集》仅一卷，其诗赋已残缺不全。据此知王祭的著作，大部在宋代亡佚，明史虽著录十一卷，仅抄录隋史中的目录而已，其原书已不存。丁福保的《汉魏六朝名家集》初刻中辑有《王仲宣集》三卷，其文从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》抄出，诗从张溥辑本录出。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俞绍初点校本《王祭集》。中华书局新校本除收录王祭的诗文（以丁本为基础整理而成）外，还附有《英雄记》。至此我们看到的是王祭创作留传下来较全的辑本。

王祭的诗有四言和五言两种体裁。四言诗对汉末国家苦难有较深刻的反映。例如《思亲诗》诗中向着已死的亡灵诉说着生者的哀痛。而此种哀痛的根源在于“小子之生，遭世罔宁”，“五服荒离，四国纷争”。又如《赠士孙文始》中说：“天降丧乱，靡国不夷”。作者以愤怒的感情，批判乱世的现实。

王粲对战乱反映最深刻，艺术性也高的当首推他的五言《七哀诗》其一。此诗是王粲由长安避难前往荆州时所作。诗中的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”十个字概括出长安一带的悲惨景象。王粲五言诗反映的另一内容，是感叹身世。《七哀诗》其二，即是写羁旅之情的。久客荆州，加之有才不被重用，使王粲对故乡无限怀恋。诗的开头两句“荆蛮非吾乡，何为久滞淫？”便先点出这一情怀。反映此种心情的还有《杂诗》其四：“鸶鸟化为鸠，远窜江汉边……邂逅见逼迫，俯仰不能言。”刘表对人才的置而不用，更加重了他羁旅的哀愁；尤其是该诗最后二句“羁旅无终极，忧思壮难任”，更说明了这一点。

王粲五言诗的另一内容是歌颂曹操的业绩。长期割据势力的混战，使王粲逐渐认识到，善用贤才，终将成统一大业者，唯有曹操。为此当他投归曹操之后，随曹军征东吴时，在诗中极力歌颂曹操。如《从军诗》五首，便是极好的例证。王粲被曹操出色的军事、政治才能所鼓舞，把征战中的一切都看成是乐观的；尽管征途中充满了艰辛，但他能以苦为乐，志气昂扬。他说：“从军有苦乐，但闻所从谁。”他在比较中知道，同是征战，如果是“所从神且武”，那么“焉得久劳师？”跟随有才能的人征战，就不会遭受不必要的劳顿。他一反“归欤”的哀叹，决心“不能效沮溺，相随把锄犁”，表达了热情洋溢的积极入世思想。历代有不少人评王粲诗，多议其“愀怆”，“苍凉悲慨”多举其《七哀诗》为建安体的代表作，而往往忽视他的《从军诗》。所谓建安体、建安诗风不仅是“悲凉”，更重要的是“慷慨”。“慷慨”中含有积极向上的精神。建安时代是大有作为、积极向上的时代。这一时代的思想就是这一时代统治者的思想，即曹操的思想。曹操的思想简括一下就是：统一天下，雄心勃勃，百折不挠，顽强进取。表现建安诗风最突出是曹操，此外在作家中就数王粲了。王粲的《从军诗》五首，场面宏大，措意深广，这在



当时是比较突出的。所以在论王粲时，在注意到他以《七哀诗》为代表的悲凉、沉郁的风格之后，还应注重他以《从军诗》为代表的乐观、进取、积极向上的风格；这才是王粲诗的全貌。

纵观王粲的著作，是以赋见称的。如果说在建安时代，王粲的诗尚不能独冠当代，那么他的赋是称雄当代而无愧的。曹丕说：“王粲长于辞赋，徐干时有齐气，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《初征》、《登楼》、《槐赋》、《征思》，……虽张（衡）、蔡（邕）不过也。然于他文，未能称是。”（《典论·论文》）曹丕这段话主要讲了三层意思：一是王粲以赋见长；二是他的赋为张衡、蔡邕这些汉代大辞赋家所不能超过；三是以王粲本人来说他的赋的成就，也高于其他文体的成就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象王粲这样著名赋家存留下来的赋仅剩二十五篇，而其中大部分也已残缺不全。

现存王粲的赋作，当首推其《登楼赋》。这是王粲羁旅荆州时的作品。该赋的特点之一是用作诗的方法写赋；特点之二是情景交融，有意境；特点之三是悲伤而不消沉，反而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。王粲的《大暑赋》也很有特色。例如写到暑季炎热时，把动植物的形态描绘得极其逼真；作者多用渲染笔法，使文章妙语横生，奇意迭出。

王粲赋注意写复杂的内心活动，这是汉末之前赋家所少见的。如他在《神女赋》中，写了对神女的热烈赞美，又写了他恋恋不舍，同时还写了内心的斗争；最后是“心交战而贞胜，乃回意而自绝。”这种复杂、曲折的内心活动表现在赋中，同王粲的诗作是异曲同工的。我们毫不夸张地说，王粲以其卓越才能，精心致力于赋的写作，使建安时期抒情小赋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，而他的《登楼赋》在赋的发展史上，树起了新的里程碑，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王粲的著作除诗赋外，论、释、铭、书、檄、颂、赞等作品